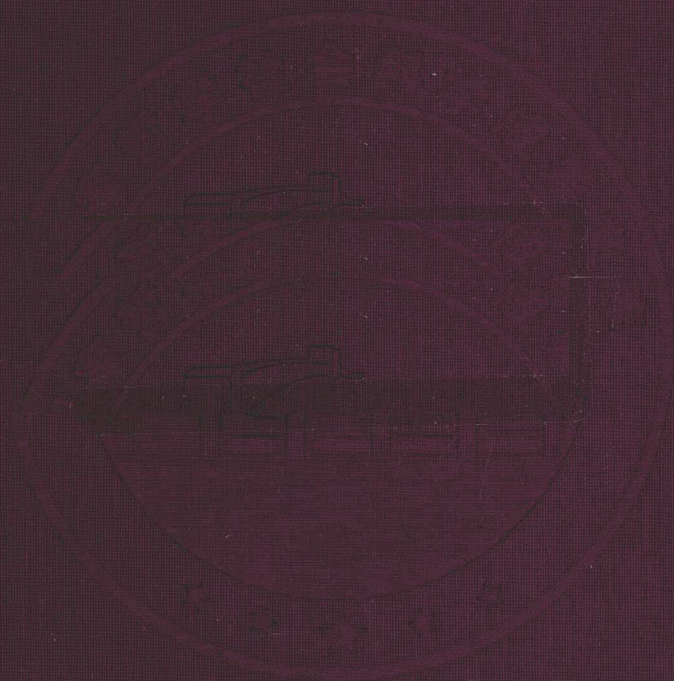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先秦名家四子研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先秦名家四子研究 (上)

董英哲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策划编辑：童力军
责任编辑：徐炜君 徐 衍
装帧设计：肖辉严克勤
技术编辑：富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名家四子研究/董英哲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3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7-5325-7206-9

I. ①先… II. ①董… III. ①名家—研究 IV. ①B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9476 号

先秦名家四子研究

The Study of Four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chool of Names in Pre-Qin China
（全二册）

董英哲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邮政编码 200020）

- （1）网址：www.guji.com.cn
- （2）E-mail：guji1@guji.com.cn
-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10×1000 毫米 1/16 插页：13 印张：54.5

字数：862 千字

版次：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7206-9/B·857

定价：198.00 元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出版说明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 2010 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1 年 3 月

序言

二十世纪名家研究的困惑与复兴

赵吉惠

董英哲教授新著《先秦名家四子研究》系我国学术界近年来研究先秦名学比较系统、全面、集文献考辨与思想理论探析于一书，容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科学思想为一体，同时又富于可读性的最新学术成果。

“名家”，在先秦典籍中本称为“刑名家”（见《战国策·赵策》）、“形名者”（见《庄子·天道篇》），而称“名家”，最初见于司马谈所著《论六家之要指》，谓：“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点出战国时期形成的作为百家之学的“名家”的学术思想要指是“正名实”。“正名实”就是正定名与实的关系，即今之所谓研究概念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中国传统逻辑学关于概念的学说。晋人鲁胜作《墨辩叙》，以为“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事不成。’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刑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荀卿、庄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别色，故有坚白之辩。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无，故有无序之辩，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两可。同而有异，异而有同，是之谓辩同异。至同无不同，至异无不异，是谓辩同辩异。……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见《晋书·隐逸传》）。鲁胜在这里不仅从社会功用、学理产生等方面把中国古代的名学、名家上溯到邓析、孔子，而且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名学、名家在先秦时期发展、演进的思想线索。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条资料。

但是，由于观察视角和研究方法之不同，近代某些学者对先秦的名家与名学，提出了诸多不同的看法，或者认为先秦无“名家”，或者认为先秦无“名学”。

胡适依据先秦古书本无“名家”之名这一现象,推断说:“古代本没有什么‘名家’,无论哪一家的哲学,都有一种为学的根本方法。这种方法,便是那一家的名学(逻辑),所以老子要‘无名’,孔子要‘正名’,墨子说‘言有三表’,杨子说‘实无名,名无实’,《墨辩》有名实之论,《公孙龙子》有名实之篇,庄子有《齐物论》,尹文子有《刑名论》。这些都是各家的名学,因为各家都有名学,所以没有什么‘名家’。不过墨家的后进,在这一方面研究得比别家稍为高深一些罢了。依我看来,惠施、公孙龙都是墨家的支派。”^①很显然,胡适只说对了一部分道理,即各家都有各家的名学这一点,而忽视了“名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学派这一事实,他更不了解《战国策》、《庄子》中的“刑名家”或“形名者”就是汉人所说“名家”这一概念的历史演变与转化关系。无论从《墨经》、《荀子》对公孙龙子所进行的批评这一点,还是从保存至今的《公孙龙子》一书的内容来看,都可以证明公孙龙子一派是以专门辩论名实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记·平原君列传》集解引刘向《别录》有“其徒綦毋子之属”一语,《淮南子·道应训》记述公孙龙渡河的故事时有“人而无能者”,不得入其弟子之籍的说法。可见公孙龙学派在当时是具有相当规模的。所以说在先秦时期不但有专门研究名实关系的“名学”,而且还有以研究“名学”为主要对象的“名家”集团。《论六家之要指》对“名家”的分类与定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王国维则认为“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他说:“战国议论之盛,不下于印度六哲学派及希腊诡辩学派之时代。然在印度,则足目出而从数论声论之辩论中,抽象之而作因明学,陈那继之,其学遂定。希腊则有亚里士多德自埃利亚派诡辩学派之辩论中,抽象之而作名学。而在中国,则惠施、公孙龙等所谓名家者流,徒骋诡辩耳。其于辩论思想之法则,固彼等之所不论,而亦其所不欲论者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静庵文集·论新学语之输入》)郭沫若在评论王国维上述意见时说:“我认为这见解是正确的。只是惠施的学说存留者无几,《庄子·天下篇》所载大一小一之说,多少还有些学术价值,而支离灭裂纯作观念游戏的公孙龙,则仅是一名帮闲而已。”(《青铜时代·后记》)他还认为“惠施、公孙龙之徒本是杨朱的嫡派”。其实,今存本《公孙龙子》中《白马论》、《坚白论》主要是辩论“白马非马”、“离坚白”等逻辑命题,而《指物论》、《名

① 胡适:《惠施与公孙龙》,《东方杂志》十五卷五号,1918年。

实论》、《通变论》等则是以阐发名家学理为主旨,可以说这是先秦名家、名学最富思辨内容的学理,这里不仅有饶有趣味的辩论,更有启发人思的辩论理论与方法,怎能说“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呢?又怎能说这是“支离灭裂纯作观念游戏”呢?显然,王国维、郭沫若在他那个时代仍然受到西方某些学者所鼓噪的所谓“中国无逻辑学”的论调的影响,使其对“名学”发生了误解。

梁启超与胡适、王国维、郭沫若都不同,他肯定并进一步发挥了晋人鲁胜《墨辩叙》的思想观点。他在分析中国学术思想产生的历史地理背景时指出:“宋、郑,东西南北之中枢也。其国不大,而常为列强所争,故交通最频繁焉。于是墨家、名家起于此间,墨家之性质,前既言之矣,而墨翟亦名学一宗师也。名家言起于郑之邓析,而宋之惠施及赵之公孙龙大昌之。名家言者,其繁重博杂似北学,其推理俶诡似南学,其必起于中枢之地,而不起于齐、鲁、秦、晋、荆楚者,地势然也。其气象颇小,无大主义,可以真自立,其不起于大国,而必起于小国者,亦地势然也。”(《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卷八“学术类”上)从梁启超这段话的意思看,他既承认先秦有“名学”,也承认先秦有“名家”,同时认定“名家者言”,起于邓析而大昌于惠施、公孙龙子。这个观点也取得了当代学术界多数的认同。杜国庠1943年发表的《论〈公孙龙子〉》,冯友兰1962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谭戒甫1957年出版的《公孙龙子形名发微》等书,也大体认同了上述观点。这个问题似乎基本解决。

二十世纪研究名家、名学最感困惑的问题之一,是关于名家文献的真伪考辨问题。这里所云名家文献,主要指《邓析子》、《尹文子》、《公孙龙子》三书的真伪问题,此外尚有《惠子》与《惠施篇》的关系与存佚问题。清代著名考据家姚际恒作《古今伪书考》把《尹文子》、《公孙龙子》均列入伪书。1931年山东大学教授黄云眉续作“补证”时,与原书合为一体,以《古今伪书考补证》书名出版,以后又多次再版。相继又有罗根泽作《邓析子探源》,肯定“《邓析子》伪书也,而前人无疑者”。另有孙次舟作《邓析子伪书考》认为“《邓析子》伪书也,而世人或信之,或疑之,或斥其伪而言之不详”。故悉加论证。二文并于1937年发表于《古史辨》第六册。三十年代以来对名家文献的辨伪,反映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倡导疑古思潮的学术倾向。

冯友兰1937年在为《古史辨》第六册出版所写的“序言”中说:“我曾说过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就中信古一派,与其说

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即要消灭;即不消灭,对于中国将来的史学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真正的史学家,对于史料没有不加以审查而即直信其票面价值的。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就整个的史学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及融会贯通两阶段,而且必须到融会贯通的阶段,历史方能完成。”我认为冯友兰的上述看法是理性主义的、有道理的、有分析的。他所谓的“融会贯通”,是指历史家的参与,这是一种肯定史学主体作用的历史观。如果说二十世纪以前中国的史学是处于盲目的“信古”的阶段的话,则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史学处于理性的“疑古”阶段。由于疑古史学否定和推翻了传统史学的“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体系,从而为建立新的科学的中国史学体系开辟了道路,顾颉刚所阐发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对于建立科学的中国历史观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由于他们对考古资料发掘与研究的欠缺,他们对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方法即以地下发掘之新资料证明传世文献资料的方法重视和运用的欠缺,因而出现疑古过分、视疑古为潮流之倾向,把有些古本文献(如《邓析子》、《尹文子》、《公孙龙子》等)视为“伪书”,在某些方面影响了中国史学的发展。这是他们的缺陷。

物极必反,见盛而衰。当中国史学步入二十世纪后半叶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作为时代学术思潮的“疑古”阶段已经成为历史,于是便迎来了“超越疑古”的中国史学发展新时期。如果相对而言,可以姑且把二十世纪前半期说成是中国史学发展的“疑古”阶段的话,则可以有根据地把二十世纪后半叶及其后视为中国史学发展的“释古”阶段。按我的理解,“释古”的前提当然是审查史料,所谓“超越疑古”,是指在正确吸收“疑古”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考古新资料、运用“二重证据”方法,纠正与克服“疑古”思潮的片面性、局限性,达到科学解释历史之目的。“释古”是长时期、立体网络工程,必须占有丰富的史料,而且要不断地发掘与研究考古新史料。仅有史料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具备科学的历史方法、科学的历史观念。历史方法与历史观念也应当不断更新、不断发展。我认为董英哲教授的《先秦名家四子研究》正是中国史学步入“超越疑古时代”即进入“释古”时代的历史产物,也是作者多年不断更新历史观念,运用科学的历史方法(交叉运用考证方法与辩证分析方法、理性的思辨逻辑与感性的直觉思维等等方法)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我们不仅应当运用科学的历史观、方法论去解释历史、判断古书,也应当运用科学的历史观、方法论去分析、解释“疑古”时代的古书辨伪工作。“疑古”时代对传世的先秦古籍大部分进行了考辨、清理,特别是他们对《尚书》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和进展,这是举世公认的,他们对古籍中的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认真考辨,确实推进和深化了中国古史研究。但是,他们对于所发现的“伪史材料”、“后人窜入的历史材料”缺乏辩证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甚至有人一发现古籍中有“后人窜入的历史材料”便视为“伪书”,视为后人“伪造”。其实,中国古籍特别是先秦古籍,往往有被后人窜入历史材料的现象。例如《论语》这部历史文献,据清人崔述的研究,认为最后五篇(《季氏》、《微子》、《楚狂》、《子张》、《阳货》)与前十五篇文体不类,又有直呼“孔子”者,遂疑为后人窜入(详见《崔东壁遗书·论语遗说·论语篇辩疑》)。梁启超不但完全同意崔东壁的见解,而且进一步指出:“《论语》各篇末尾几乎都有一二章不相关的话,那自然是读书时添上去的,后人刻印时加入正文,而后无人敢怀疑。”(《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六章甲《论语》)尽管如此,历代学者无人敢怀疑《论语》为伪书。这除了历史上经学所处的独尊地位外,还因为学者们对这部书有个基本的分析和历史定位,并不因为书中有后人窜入的历史材料而判定它是伪作。再如《荀子》一书据唐人杨倞考证,有些篇章被指为荀卿弟子所记卿语及杂录传记,肯定全书并非悉出荀卿一人之手。梁启超更为具体地说:“今案读全书,其中大部分固可推定为卿自著。然如《儒效篇》、《议兵篇》、《强国篇》,皆称‘孙卿子’,似出门弟子记录。内中如《尧问篇》末一段,纯属批评荀子之语,其为他人所述尤为显然。”(《荀卿及〈荀子〉》载《古史辨》第四册上编)我认为崔东壁、梁启超等学者对于《论语》、《荀子》等古籍的考辨方法和定性分析都是合情合理的、可取的。我们对待古代文献特别是先秦文献要特别采取审慎的态度,切不可一发现有后人窜入的材料,便去否定全书。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对于先秦古籍及古籍中的依托材料曾经发表过很有分析力的深刻见解。他说:“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

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断断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关于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一》)这是我们认识、考辨和运用先秦古文献以及古书中的依托材料很可取的方法。我们运用这些方法再去考辨、分析先秦名家文献《邓析子》、《尹文子》、《公孙龙子》等,便容易探求到实事求是的结论,既不会轻易判定它们是伪书,也能大体考究出它们的历史面目与历史演变。今后历史学的主要任务是运用科学方法正确地释古,科学地解释历史。

六十年代以后,又有人重新提起并辩论《公孙龙子》一书的真伪问题。庞朴 1965 年在《文史》第 4 辑上发表《公孙龙子辨真》一文,为传本《公孙龙子》一书辨真。1979 年他又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公孙龙子研究》一书,坚持认为“今本《公孙龙子》正是古本《公孙龙子》”,“原书本来只此六篇,《汉志》所记应该有误”。沈有鼎 1978 年在《哲学研究》第 6 期发表《〈公孙龙子〉的评价问题》与庞朴针锋相对地提出“现时流行的《公孙龙子》六篇,据考证可能是晋代人根据一些破烂材料编纂起来的”,“汉代流传的《公孙龙子》十四篇已不复存在”。针对以上两种不同的观点,1979 年 10 月我撰成《公孙龙思想研究》一文投《哲学研究》编辑部,1980 年发表于《哲学研究》丛刊《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二辑。认为“今本《公孙龙子》六篇,除《迹府》为后人撮录其生平事迹之作而外,其余五篇当为公孙龙之作品”。又于 1982 年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三届年会上发表了《今本〈公孙龙子〉考辨述评》^①把庞朴的观点归纳为“全真”说,沈有鼎的观点概括为“伪造”说。我提出:“既不能说今本六篇出于后人‘伪造’,亦不可谓今本六篇就是古本《公孙龙子》。今本《公孙龙子》很可能是原书的残篇。”^②至此,关于《公孙龙子》真伪的讨论形成三种比较定型的观点。此后的讨论仍然围绕这三种观点展开,大体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二十世纪研究名家、名学最感困惑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则是“名家”学者是否诡辩家、“名学”是否诡辩论的问题。说“名家”是诡辩家由来已久。《庄子·天下篇》评论惠施、桓团、公孙龙等“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

① 赵吉惠:《今本〈公孙龙子〉考辨述评》,《古籍整理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② 赵吉惠:《今本〈公孙龙子〉考辨述评》,《古籍整理论文集》,第 104 页。

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荀子·非十二子》在批评“名家”时说:“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汉代扬雄著《法言·吾子篇》记载有人批评“公孙龙诡辞数万”云云。不论荀子斥名家为“玩琦辞”,还是《法言》责公孙龙为“诡辞数万”,都是后来犹言“诡辩”之意,据此,有些治中国古代思想史学者,便将名家或“辩士”称为“诡辩家”或“诡辩学派”。这个问题在国外也有相当影响。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宇野精一认为:“中国逻辑思想发展过程,大致分为两大学派:即诡辩派和逻辑学派,诡辩派以邓析、惠施、公孙龙为代表,他们亦称为‘名家’或‘辩者’,为了论证自己的意见,发展了论证术、辩论术,这是中国逻辑的实用性特点。逻辑学派以《墨经》六篇和《荀子·正名篇》为代表。”这种逻辑思想的先驱,是提出以“三表法”作为论断标准的墨子。宇野精一认为,墨经的逻辑、荀子的逻辑,代表了中国系统、正确的逻辑思想。^① 这种划分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墨辩逻辑与惠施、公孙龙等“名家”逻辑的思想差异,然而他们却不理解惠施、公孙龙逻辑的真正含义,不认识中国“名学”的思想本质,他们不善于运用逻辑概念论关于内涵与外延关系的原理去透视与分析古典名学的各种逻辑命题和逻辑论证,因而产生了对于惠施、公孙龙等“名家”逻辑的误解。其实,就在日本学者中仍然存在不同于他们的另外一种见解。加地伸行教授就说:“荀子所谓公孙龙诡辩这一评价,归根到底乃是基于其立场所决定的,并不具有任何权威。因此,可以说公孙龙等人的论理学(逻辑学),其性质不受传统形式论理学(逻辑学)之限制的可能性极大,不可一味地说是诡辩。”他还肯定说:“就哲学史而言,认为以公孙龙之论理学(逻辑学)为诡辩这种评价,并无意义。”^②

视“名家”为“诡辩”的思想,长期困扰着中国的学术界。自二十世纪初期即1919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适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问世,开始用现代方法研究“名学”,以至于八十年代出版的有影响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著作,对于先秦名家的评价始终没有完全摘掉“诡辩”这顶帽子。胡适

① 引自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室编《中国思想史》第二章,《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

② 引自辛冠洁等编:《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86年版。

说：“惠施、公孙龙一般人，有极妙的学说……用许多极怪僻的‘诡辞’互相争胜，终身无穷。那时代是一个危急存亡的时代，各国所需要的乃是军人政客两种人才，不但不欢迎这种诡辩，并且有人极力反对。”^①1963年出版、至今重版多次、由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七章中批评惠施、公孙龙学说“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某种诡辩的倾向，或者为诡辩论提供了思想的基础”。^②1982年出版、至今不断再版、由肖萓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三章批评公孙龙一派的“别同异，离坚白”的观点“不能不走向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还可能导致诡辩”。指责惠施强调同异的相对性“容易陷入相对主义的诡辩”。^③1963年出版、至今不断再版、由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史纲》第三章第五节斥责“公孙龙的诡辩论题是很多的，所以古代文献说他有‘诡辞数万’，但他的烦琐的论辩都是从‘指’的概念出发的”。^④1980年由何兆武、步近智、唐宇元、孙开太合作出版的《中国思想发展史》第三章第三节仍然批评惠施、公孙龙子“虽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问题，但是，他们往往流于玩弄概念，陷入诡辩”，还说“公孙龙‘离坚白’学说的诡辩性质，在他的‘白马非马’的命题中表现最为明显”。^⑤

中国学术界关于“名家”研究，长期难以摆脱“诡辩”困惑的原因当然错综复杂，其中深层的学术思想原因，主要是长期以来受到传统经学的影响，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教条主义学风影响所致。不少的著述，习惯或满足于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诡辩论”等西学化的判断语代替具体、深入地对名家深奥学理、形式反常但富于思辨的逻辑命题的耐心分析，致使先秦名家学者们的超越性智慧、反向性思维方式没有能够被认真地研究与发掘出来。

我基于对“名家”辩论术与反向性思维方式的特殊兴趣，自七十年代便集中精力专门收集并研究先秦名家文献，1979年夏季写成《论公孙龙的哲学思想》一文，在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科学讨论会上做了报告，发表于《甘肃师大学报》1979年第3期，认为惠施、公孙龙许多命题虽然“有形而上学的错误，但不能归结为形而上学；有唯心主义的错误，但不能归结为唯心主义体系；有走向

①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八篇别墨第六章墨学结论。

②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9页。

③ 肖萓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5页。

④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史纲》上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100页。

⑤ 何兆武、步近智、唐宇元、孙开太：《中国思想发展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92、95页。

诡辩的因素,但不能归结为诡辩论”。这篇论文的主要精神是积极肯定惠施、公孙龙的学术成就与贡献,认为他们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积极的思想遗产的一部分,他们提出和论证过一些超时代的深不可测的命题,他们不愧是解放思想、追求真理的大师,对于古代哲学,特别是古代逻辑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八十年代又连续发表四篇论文^①进一步阐发这些观点。我注意到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出版有十余种研究与注释《公孙龙子》的学术著作,发表一大批学术论文。这说明学术界一批学者,把研究视线已经集中于“名家”研究领域,学术见解已经由三十年代对名家著作的“辨伪”转向陆续“辨真”,已经由传统的对名家思想偏于否定、批评,转向现代的对名家思想偏于肯定和诠释。这些学术动向表明,我国学术界对于先秦名家的研究已经走出了困境,已经形成了令人兴奋的名家研究复兴的局面。

董英哲教授治名学有年,由于我们都在西安市工作,故经常在一起切磋名学问题,交流见解,相得益彰,并知其学有所长、功底深厚、长于理论思维。近期他专门派研究生将其新作《先秦名家四子研究》书稿在即将付梓之前送我阅读并命为之作《序》。我在粗粗地翻阅了全稿之后,受益匪浅,甚有先睹为快之感。这部洋洋八十余万言的巨著,不论从结构、规模、体例上,还是从深度、广度、所涉及的问题领域看,都可称得上是本世纪研究先秦名家的集大成之作。作者不但在本书中研究、评述了本世纪学者们讨论的有关邓析、尹文、惠施、公孙龙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及其著述文献的真伪、历史演变等重要学术问题,每有新义、创见,而且还以相当篇幅论述了过去学术界不太注意的“名家”的科学思想、政治思想。对于惠施的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科学思想都做出了新的阐发,这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本书在总结战国时期科学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对名家提出的若干难解的逻辑命题,给予了新的诠释与解析,令人耳目一新。本书的内容与体例对于先秦名家四子,既有生平传略的述评,又有著作文献的考辨;既有学理的分析评价,又有对古典文献所作的现代汉语翻译;既有对元典文献佚文的收集整理,又有对当代学者研究名家著述的按人分类目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对二十世纪学者们研究先秦名家学说所做的一次系统的综合与总结。不论对于初学者、文科

^① 后收入1991年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儒学命运与中国文化》一书。

大学生乃至专业研究人员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参考意义。尽管本书还存在某些需要进一步商榷与切磋的问题,还有需要进一步改进与完善之处,但是,在总体上看,它在充分吸取、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诚可谓“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荀子·劝学篇》)。我为英哲教授的新著问世而高兴,更为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增添一部力作而庆幸。在高兴与庆幸之余,特撰拙文,放论名学,略抒情怀,与作者共勉之。是为序。

赵吉惠

撰于陕西师范大学乐处书斋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日·西安

前 言

这部书稿撰成后,曾在几位师友和一些研究生中流传。他们很感兴趣,都希望能够早日出版,并对书名和内容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根据好友赵吉惠教授的意见,我将书名定为《先秦名家四子研究》。顾名思义,这部书主要研究春秋战国时代名家学派的四位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尹文、公孙龙及其著作和思想学说。全书约80多万字,前有导论“名家学派概观”,后有附论“名家学派与其他学派的关系”,主体部分共有四编:第一编“邓析与《邓析子》”;第二编“惠施与辩者”;第三编“尹文与《尹文子》”;第四编“公孙龙与《公孙龙子》”。

导论对“名家”概念进行了界定,把名家划分为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研究了名家学派的兴衰及其与社会大变革、名辩思潮的关系。名家学派处在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代,重视科学技术,促进了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强调法治,推动了当时的政治改革;“正名实而化天下”,有利于澄清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许多混乱问题;具有“爱民”、“利民”的民本思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对人民力量的重视;其“无厚论”在反对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分封制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名家学派不仅是社会大变革的促进派,而且还是名辩思潮的主力军。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尹文和公孙龙,总领名辩思潮之风骚长达三个世纪之久,为名辩思潮的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

第一编主要研究名家学派创始人邓析及其书和学说。学术界对邓析及其书和学说的评价历来不公,可以说是古今交毁。什么“诡辩奸人之雄”呀,什么“后人抄掇的伪书”呀,什么“相对主义的诡辩论”呀,不一而足。这些不实之词,几乎成为不可更改的定论。其实不然,我们应该还邓析以本来面目。他作为春秋末年的伟大思想家是当之无愧的,不仅可与老子、孔子并驾齐驱,而且在某些方面还超过了他们。例如,邓析具有强烈的改革意识,反映了当时民众

的进步要求;他的名实理论与辩论艺术珠联璧合,为先秦的名辩思潮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他的两可之说和哲学观点切实而有智慧,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积极进取的精神。

第二编主要研究战国中期名家学派的核心人物惠施与辩者的思想。惠施继邓析之后,把当时波澜壮阔的名辩思潮推向了高峰。他是一位功勋地主阶层的进步政治家、杰出的科学思想家、中国传统辩证逻辑的奠基人和有机宇宙哲学的开创者。他的有机宇宙哲学富有智慧的灵光,充满着朴素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比古希腊的机械原子论要高深得多,曾推动了我国古代宇宙理论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对当代和未来科学的发展也很有意义。本编在重点研究惠施思想的同时,还剖析了辩者的著名论题,论述了兒说、田巴、桓团、毛公、綦毋子、黄疵、成公生等人的名辩思想。名家学派的诸辩者,不仅具有深邃的科学思想,而且还有一条超越常规的思路。这条思路带有智力叛逆的性质,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智慧。

第三编主要研究战国中期名家学派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尹文及其书和学说。尹文是齐国稷下学宫的著名学者,虽师承道家学派的宋钘,但却归属名家学派。他的学说内容相当丰富,包括深刻的社会观念、进步的政治主张、系统的形名理论和朴素的哲学思想,具有兼综百家的思想特色。其书名曰《尹文子》,虽残缺不全,且有错讹衍漏,但并非“伪书”。它在先秦思想文化的百花园中,犹如一朵奇葩,闪烁着绚丽夺目的光彩!特别是其中的形名理论,可以说是中国逻辑思想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它上承邓析的名实理论,下开公孙龙名辩论的先河,把先秦的名辩思潮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为我国古典形式逻辑概念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四编主要研究战国后期名家学派集大成者公孙龙及其书和学说。《公孙龙子》一书虽残而真,是公孙龙学说的精髓所在。公孙龙学说包括《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和《名实论》,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可以简称为名辩论。他的名辩论在政治倾向上是进步的,且有一定的科学基础和丰富的哲学内涵。其主要贡献是在逻辑思想方面,他精于概念分析,论证了以“实”为标准的正名原则,揭示了形式逻辑的三条基本规律。假若把先秦名辩思潮的发展比作一串相互套在一起的圆圈,那么,公孙龙恰好就站在这些圆圈的会合点上。他以一个压轴戏的角色出场,其名辩理论体系之严密,其名辩思想内容之深邃,都是其他先秦诸子所无法比拟的。

附论主要论述了名家学派与道家、儒家、墨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杂家等学派的关系。名家学派与这些学派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相互争鸣又相互融合,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个“黄金时代”里,名家学派处于何种地位,扮演了什么角色?名家是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中最活跃的一个学派,处于“争鸣”的核心地位,可以说是“百家争鸣”的一个关节点。只要抓住这个关节点,其他学派研究中的一些难题就好解决了。例如,道家黄老学派是怎样形成的,儒家孟、荀的分歧,墨家前后期的不同,谁是法家学派的先驱,纵横家的思想渊源在哪里,等等。只要抓住名家这个关节点,此类难题都会迎刃而解的。

总而言之,先秦名家学派对我国传统思想文化有许多独到奇特的贡献。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早就指出:“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正名实”,就是要摆正名与实的关系,这正是名家学派的主旨所在。《汉书·艺文志》列名家者流凡七人,书三十六篇,但大都遗失。今存《邓析子》、《尹文子》、《公孙龙子》三书均残缺不全,又多被视作“伪书”。因此,在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中,名家是最薄弱的一环,也是最难突破的一环。如何突破这一环?无疑是长期以来困扰着海内外学者的一个棘手问题。对于这个难题,我和我的研究生们采取了“知难而进”的态度,试图在攻克难关方面摸索出一些路数来。通过几年的摸索,我们有四点不太成熟的体会:

第一点体会是敢于“走出疑古时代”。几年前,李学勤先生在一次小型学术座谈会上作了题为《走出疑古时代》的精彩发言,后来又作《谈“信古、疑古、释古”》一文补充那次发言。他认为,冯友兰先生的“信古、疑古、释古”之说,涉及到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信古”一名之生,是由于疑古思潮的兴起,在疑古出现以前并无其说;“释古”一名的提出,又是为了与疑古有所区别。所以,“信古、疑古、释古”一说的出现,关键仍在疑古思潮的盛行。大家知道,疑古思潮盛行于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其影响表现最显著的是在古书的辨伪问题上。疑古一派的辨伪虽说成效昭著,但有“扩大化”的倾向,如说“中国伪书极多,汉以前古书几乎无可疑”。这样一来,势必造成许多“冤假错案”。以名家而论,《邓析子》、《尹文子》、《公孙龙子》都被疑古派说成是“伪书”,显然是“冤假错案”。这在史料方面,就为名家研究设置了一道难关。只有攻破这道难关,才能“走出疑古时代”,开创名家研究的新局面。